


《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作者：王兴先

发布时间：2008-09-01

浏览数：57

 打印文章

文字大小 【小】 【中】 【大】

[摘要] 藏族史诗《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中篇幅最长、影响极广、哲理最深、文化内涵最丰富、生态理念最突出……加之她又是唯一一部活形态史诗，认识价值最高，从而对她的研究已形成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格萨尔》学。

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是古代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今天，我们在《吉尔伽美什》、《伊利亚特》、《奥德赛》、《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罗兰之歌》、《伊戈尔出征记》、《松迪亚塔》等多民族史诗研究中更应看到：一是《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中是唯一一部活形态史诗，至今还有众多的艺人在继续说唱；二是世界上没有哪一部民族史诗像《格萨尔》在国内外产生这样大的广泛影响，它不仅流传于我国的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白族、傈僳族等多民族群众当中，而且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与这些民族各自的古代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各具本民族文化特质的《格萨尔》，其中尤以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的《格萨尔》最为突出，同时还流传到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其中尤以布里亚特《格斯尔》、巴尔蒂《格萨尔》和拉达克《格萨尔》最具特色；三是《格萨尔》不仅是世界最长史诗，而且哲理深邃，那一行行富有哲理的诗句，在今天仍在启迪和警示人们；四是《格萨尔》所反映和强调的是藏、汉团结的爱国统一思想和崛起奋发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仍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五是《格萨尔》所描述的丰富的生态文化及其生态理念，只要我们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转换其宗教信仰理念，在重视生态的21世纪必将显示出它的现代价值；六是《格萨尔》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包括民族、语言、宗教、民俗、军事、政治、经济、伦理、心理、神话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不仅为创造《格萨尔》学这一新兴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而且已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上述六点则毫无疑问地确立了《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为了更加有效、高质量地保存这一传统优秀文化遗产，西北民族大学决定将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大型系列丛书《格萨尔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交付国家A级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库》共5卷20册，约3000多万字。第1卷藏族《格萨尔》，8册；第2卷蒙古族《格斯尔》，5册；第3卷土族《格萨尔》，5册；第4卷裕固族《格萨尔》，1册；第5卷《格萨尔音乐曲谱》，1册。《文库》对有本民族文字的《格萨尔》在对原文整理规范的基础上翻译成汉文，并附有注释和版本说明；对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本民族文字的《格萨尔》则在国际音标记音对译的基础上翻译成汉文，并附有解题研究。这是西北民族大学为了弘扬我国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研究中的地位，不惜巨资出版这套《文库》而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对我们从事《格萨尔》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的鞭策。

《格萨尔》为解析和研究世界多民族史诗在其产生、演变和形成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大量史料，其认识价值很高。在这里，笔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仅以《格萨尔》史诗提供的资料，就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予以解析，试图求得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自1788年发现《伊利亚特》威尼斯抄本中保存的一些注释之后，再次促使人们重新研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其形成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构成了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此后，研究者们将各家争论的观点基本上归纳为三点：一是“短歌说”。主张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沃尔夫（1759~1824年）和卡尔·拉赫曼（1793~1851年）。他们认为不借助文字就不可能创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长篇巨著……断言每部史诗都曾由若干独立的诗歌组成，由不同的歌手们演唱，后来经过多次整理加工，记录成文字的。二是“统一说”。主张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尼奇（1790~1860年）。他认为荷马虽然使用了古代民间诗歌的材料，但重新作了加工，使每一部史诗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布局……创作长篇史诗不一定非借助文字不可。三是“核心说”。主张这一说法的学者是德国的赫尔曼（1712~1848年）和基希霍夫（1826~1908年）。他们除折中上述两种观点之外，且明确指出有关阿基琉斯的愤怒的文字是《伊利亚特》的核心，奥德修斯返乡的故事是《奥德赛》的核心，其余都是后来添加的。^[1]

笔者认为上述的“短歌说”、“统一说”和“核心说”这三种说法都是一部民族史诗在人民群众集体创作过程中的几个不同阶段，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这样，中国的《格萨尔》和其他的民族史诗也大致如此。所谓“荷马问题”至今尚未定论，笔者看问题的症结在于就“荷马问题”而研究“荷马问题”。没有与世界多民族史诗尤其没有与中国的活形态史诗格萨尔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藏族史诗《格萨尔》约有300余部分部本，除去异本约有120余部，几乎囊括了格萨尔自天界降到人间、称王登位、南征北战至大业完成后又返回天界等全部内容，但中心还是征战，是正义战胜邪恶。就从这120余部分部本《格萨尔》史诗结构的整体讲，每一部分部本就是其中一首有序的“短歌”，然而它并不像芬兰史诗《凯莱维拉》中的“短歌”（指一首歌曲）那么短，最短的“短歌”也有1300或2000余诗行的，如《安定三界》、《地狱救妻》等；最长的“短歌”还有长达22000或48000余诗行的，如《霍岭大战》、《突厥兵器宗》等。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在这些最长的“短歌”中还插有许许多多的几十行或上百行的“短歌”，如《马赞》、《弓赞》、《帽赞》等之类的赞歌，它们的穿插是由说唱艺人视情而定，虽然随意性较大，但并不影响每部分部本整体的艺术效果。此外，还有把最长的“短歌”中的某一小情节从中抽出来，然后以此为基础再独辟蹊径创作出一首新的“短歌”，如：从《霍岭大战》分离出来的《辛丹相争》长达4400多诗行，从《大食财宗》中分离出来的《分大食财》也长达1400多诗行。如果从《格萨尔》史诗结构的整体性来看待，把它们只能算做插曲，而不能列入《格萨尔》史诗里有序的“短歌”。然而这些插入的“短歌”和依据某一小情节再创作的新的“短歌”却给我们提供了分析《格萨尔》史诗中一首首有序的“短歌”所形成的久远的历史历程。如一提到《分大食财》这首插曲，读者便会自然地想到《大食财宗》，因为如果没有格萨尔大王统领岭国众将士征服大食国，也就不可能产生描述分大食国财物的《分大食财》这部《格萨尔》史诗的插曲。《旧唐书》载：

“……自阿蒲罗拔后改为黑衣大食……贞元中，与吐蕃为勃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贞元中约系799年前后。《新唐书》也载：“奚深种孙阿蒲罗拔为王，更号黑衣大食……贞元时，与吐蕃相攻，吐蕃岁西师，故鲜盗边。”由此可见，《格萨尔》史诗中的《大食财宗》就是反映我国唐代贞元时吐蕃与大食之战的史诗作品，由此也就产生了《分大食财》这样的“短歌”插曲。又如前举的《辛丹相争》“短歌”，它也是《霍岭大战》的插曲。唐代中期吐蕃称“回鹘”为“霍尔”，先称回纥。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和回鹘发生过多战，在《格萨尔》中最为著名的《霍岭大战》就是以说唱艺术反映这一战争的历史事件的。在《霍岭大战》中霍尔国失败投降于岭国，霍尔国大将辛巴梅乳孜被岭王格萨尔重用封为岭国大臣，这时岭国大臣丹玛则坚决反对，从而也就产生了《辛丹相争》这部非有序的“短歌”插曲。这就是笔者所论析的《格萨尔》史诗之“短歌说”。谈及《格萨尔》的“核心说”，不论《格萨尔》史诗篇幅有多长，但它还是有自己的核心故事的。从格萨尔诞生、登位称王到降伏四魔和征讨18大宗等一系列说唱部本则应是《格萨尔》史诗的核心故事。至于“统一说”，《格萨尔》虽系古代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至今还在传唱，但一代又一代众多的著名说唱艺人，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也是他们在《格萨尔》史诗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地吸收藏族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而创造《格萨尔》；依据历史事件的真实，艺术地传承了《格萨尔》，在“统一说”中起了关键作用。

综合上述，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文学史上长期争论的所谓“荷马问题”中的“短歌说”、“核心说”和“统一说”则是每一部民族史诗在其产生、演变和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研究者们不能仅从一个角度着眼将它们割裂开来。这也是笔者要说的《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研究中所显示的重要价值。

作者：王兴先（1936-），甘肃临洮人，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格萨尔》学研究。（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甘肃兰州730030）

责任编辑：宗哲

文章出处：《西藏研究》2007-1

本文注释信息：

[1]：

陈洪文. 荷马和荷马史诗 [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标签：《格萨尔》 世界多民族史诗

无法找到该页

您正在搜索的页面可能已经删除、更名或暂时不可用

请尝试以下操作：